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Zhongguo Jingji Zuanxing Yanjiu

林战平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Zhongguo Jingji Zhuanxing Yanjiu

林战平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转型研究/林战平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209-07877-1

I. ①中… II. ①林… III. ①中国经济—转型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274518号

责任编辑:李明功

封面设计:王圆圆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7877-1

定 价 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1)82079112

内容提要

从广义上理解，经济转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体制转型（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和结构转型（Structure Transformation）。前者是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者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体制转型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制度创新，而结构转型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经济转型首先是一种双重的转型。双重转型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基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考虑，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任务即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从发展意义上说是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转向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即落后农业国的工业化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这可以看作是发展转型。第二层含义是基于传统的封闭型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作用导致经济发展长期缓慢落后的考虑，中国必须打破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机制，逐步建立现代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完成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尽快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的过程，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显然，体制转型本身包括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方面的内容和任务。

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必然是与宪法制度的变化相伴随的，在市场化改革的背后，往往出现的是对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性质与其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不如说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更为准确。中国的体制转型则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模式和道路，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会推动宪法制度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

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中心课题。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这三重转型便构成了本书对转型概念内涵的界定。

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以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运用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演绎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道路选择、转型模式、转型战略与策略等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的分析，并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1.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在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仰，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更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有利于富国强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源国有化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经济落后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初始资本。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1936 年）民族资本总额为 72 亿元。可见，靠薄弱的民族资本是难以撑起工业化的。不仅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时间来等待薄弱的民族资本慢慢地自我成长，因为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时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资源。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的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因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2. 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目标、战略，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无论有人对赶超这一提法讳莫如深，甚至反对，赶超事实上早已无可逆转地成为所有后起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然逻辑。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针对此种意见，本书考

察了比较优势理论和赶超理论的内涵及其思想渊源，分析了后发优势理论及其与不发达现象的高度相关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优先生产的规律”和“霍夫曼定理”的普适性，再加上苏联经验的示范效应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制约，论证了中国选择赶超战略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3. 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当前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存在着“市场教条主义”（或“市场拜物教”）倾向，主要表现为“神化”市场经济或“妖魔化”计划经济。鉴于此，本书从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计划经济的产生极其本质属性、斯大林模式和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等方面，特别是从高速工业化政策和经济运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发展战略的推行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出发，论证中国一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内在逻辑大致如下：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短缺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可见，计划经济有计划经济的道理。

4. 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绩效？这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只是近30多年才有发展，前30年只是一部荒唐史，显然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他们看不到毛泽东把一个世界最落后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的事实。本书通过大量实证分析，说明计划经济时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没有计划经济打下的基础，就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计划经济所具有的经济运行特点，在奠定或扩展国家工业化基础的时期，在粗放式增长或者说生产力数量增长型阶段，是起过巨大作用的。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割裂开来显然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5. 国内外经济学界将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归纳为“渐进主义”或“渐进式改革”，以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相比照。为什么同为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中国和苏联、东欧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或归结为不同的初始条件，或归结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归结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或归结为不同的改革方式，等等。不同观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中国渐进式

改革的一些特点和经验，这些不同的概括虽然各有侧重，但大都是在改革的目标相同而且确定的假定前提下围绕着改革方式（过渡方式）的差别而展开讨论的，而没有深入考察改革过程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改革的方式是内生于改革目标的，而改革的目标又是社会结构特别是宪法制度的产物。从实际的改革过程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分野主要不是由于对市场化的速度、方式和次序的不同安排造成的，而是 1989 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起主导作用的社会集团对于改革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不同态度造成的。本书综合、比较分析了国内外“过渡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然是与宪法制度的变化相伴随的，在市场化改革的背后，往往出现的是对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性质与其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不如说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更为准确。中国的体制转型则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模式和道路，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会推动宪法制度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中心课题。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1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9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框架.....	12
第一章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型理论的简要回顾.....	17
一、经典现代化模式.....	18
二、依附论发展模式.....	25
三、世界体系理论.....	28
第二章 制度选择与经济发展.....	31
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31
二、社会主义与东方落后国家.....	33
三、制度选择与工业化类型或模式.....	36
四、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	40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逻辑——赶超战略.....	46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	47
二、后起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赶超命运.....	53
三、“后发优势”理论与赶超战略.....	55
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赶超战略”的选择.....	61
五、“赶超战略”的实施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	70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必然.....	73
一、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	74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77

三、斯大林模式及其影响.....	81
四、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影响.....	85
五、“赶超战略”与计划经济.....	88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	97
一、投资品导向工业化战略利弊分析.....	97
二、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增长.....	100
三、改革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09
四、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	117
五、简短的评论.....	118
第六章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从计划到市场.....	120
一、体制转型的动因.....	121
二、市场经济选择的必然性.....	123
三、体制转型的目标.....	129
四、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及其逻辑.....	136
五、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	143
六、初始条件、转轨方式与经济绩效.....	145
七、对中国经济转轨经验的不同理解.....	151
第七章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从封闭走向开放.....	157
一、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	157
二、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战略转变.....	165
三、开放型经济利弊分析.....	171
四、“东亚奇迹”怀疑论及其启示.....	171
第八章 产业结构的变迁.....	174
一、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上的考察.....	174
二、改革前中国产业结构的巨变与偏差.....	178
三、市场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	182
四、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	189
五、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与政策建议.....	191

第九章 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当代选择

——从传统工业化道路到新型工业化道路	195
一、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定位	195
二、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特征	199
三、对中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评价	203
四、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05
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213

第十章 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变化 216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成就	217
二、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225
三、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难	229
四、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政策取向	234
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237

参考文献 240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关于经济转型的研究，长期以来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重视，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解体，经济转型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就中国而言，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其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实，这一变迁可视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转型，研究这一转型业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具体而言，中国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型乡村社会向工业型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历史角度分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转型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特有现象，而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中国不仅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和资源背景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的特点。从现实角度分析，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仍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其实质乃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继续追求。

就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自 20 世纪初以来，提升民族的自身地位以及寻求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一直围绕着中国的政治舞台，其目标是摆脱对外部列强的依赖。在探索现代化的百年过程中，从早期“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后来的国民党统治和毛泽东的社会与政治革命，到当今的邓小平式经济改革和“新经济”时期的经济全球化，都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经济转型。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在经济上可以认为只有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人类世界似乎永远作为“普遍法则”而运行。因此中国人表现出了“发展经济”

的普遍诉求。近代，张之洞和李鸿章主张的“洋务运动”是凭借国外科技之力，在不改变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没有自由化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康有为希望能模仿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模式对中国进行改良，尤其是在教育制度、军队和政治体制领域，但是帝制予以保留；孙中山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原则，对银行和重要的经济部门进行国有化，吸引外国投资，发展民族产业。由于当时中国的地方割据和各列强的利益冲突，孙中山未能如愿以偿；蒋介石实行官僚资本主义，以社会和经济管制为核心，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经济不能全面发展；毛泽东时代奉行中央计划经济，实施彻底的国有化经济政策，其计划经济不仅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也有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实施的供应制度和封建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烙印，由于这种经济体系建立在僵硬的意识形态之上，因此人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在 1978 年，面对“文革”之后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崇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了中国经济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向国际化的转型。加入 WTO，中国将从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开放”发展到“对外融和”，使中国的经济运作和社会管理更富有成效，成为现代化的效率社会。

（一）中国经济的特性

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总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统一，由不发达转向发达，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又包含经济的较快发展。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经济是中国经济，而不是美国经济、印度经济、日本经济或其他国家的经济？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是发展中经济，发展中经济就是从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向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过渡的经济。这基本上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

第二，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第三，中国经济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经济。这是一个“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的问题。所谓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第四，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一个大国的经济是很不同于一个小国经济的。如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产品市场和外贸战略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各自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性。

因此，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问题，我们必须同时直面上述四种现象，这也是中国经济复杂性之所在。中国“正处在两大历史变革的阵痛之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到向城市、工业社会的变革。”^[1]

（二）“转型”概念的含义及本书的界定

“转型”一词，近些年来在国内外经济学文献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文献当中频繁出现，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关于转型概念的内涵理解和转型研究的范围界定，则并不完全相同。大体说来，主要有三种并不完全相同的认识：

第一，将转型理解为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的发展阶段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1840年以后，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压力和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例如，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曾经就“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问题有过很大的分歧。后来经过讨价还价，最后把我国作为一种特殊的“转型国家”来对待。这种“转型国家”，既不属于典型的发达国家，也不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显然，这主要是从生产力角度来考虑的，强调的是经济形态的转型。

第二，将转型理解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例如，1997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我国高层学者专题研讨会上，占主流的观点基本上认为，我国的转型期就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或过渡的时期。其起点是原先以计划手段作为配置经济资源主要方式的计划经济，终点是以市场手段作为配置经济资源主要方式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代表着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关于转型问题研究中的主流意识。显然，大部分学者所说的转型，主要是从经济体制角度来考虑的，强调的是制度形态的转型。

第三，实际上是综合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把转型既理解为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又把转型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例如，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课题组于1997年提出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一是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

[1] 唐永胜等编：《21世纪中国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激发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显然，这里所说的转型，是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对象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作为特定的研究内容。

可见，人们对转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转型问题涉及的面很宽，与此相关的问题也很多，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切入，都可以展开。在学术界，不同的学者就是根据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展开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转型概念的理解和不同的转型理论体系。例如，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化，研究增长方式的转型；过渡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化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研究社会形态的转型。就狭隘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意味着原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就广义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全面的过渡、转变以及变化，即表现为经济制度的转变以及变化。中国学者根据其现状，将经济转型分为两个方面：即体制转型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和结构转型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前者是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者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体制转型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制度创新，而结构转型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1]

总之，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转型是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国家都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对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而言，其经济体制的安排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也存在着从一种现存的经济制度向另一种更为合理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内涵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同时并存（即二元经济特征）是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之一；同时，由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也会出现同时并存的现象。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之为“二元经济结构”，后者则为“二元体制结构”。中国的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说，既是从二元经济结构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结

[1] 李培林：《中国改革中期的制度创新与面临的挑战》，《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构过渡过程中的体制转型，同时又是在二元体制结构向更高层次一元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经济形态的转型。因此，“转型和过渡是现代化进程，其特点在于现代化进程的目标是明确的：接受、建立、吸收现代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法制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和过渡都是赶超式的现代化”。^[1]

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转型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它与苏联、东欧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向先进的工业国，出现了从传统增长方式向现代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自我完善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了相应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因此，中国经济转型首先是一种双重的转型。双重转型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基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考虑，经济发展中最基本的任务即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从发展意义上说是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转向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即落后农业国的工业化任务依然非常艰巨，这可以看作是发展转型。第二层含义是基于传统的封闭型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约作用导致经济发展长期缓慢落后的考虑，中国必须打破旧的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机制，逐步建立现代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完成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尽快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化的进程，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显然，体制转型本身包括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方面的内容和任务。这种双重转型不仅在时间上是继起的，而且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市场化、工业文明和市场文明是一个合二为一变迁过程。在苏联、东欧国家中，工业化和市场化是分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市场化成了转型的唯一主要目标。而中国的情况则复杂得多。1949年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新中国的建立大大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化的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特别是长期以来实行的以户籍或身份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制度，使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二元结构和身份差别进一步凝固化了。直到1980年，中国80.6%的人口仍然属于乡村人口，68.7%劳动力仍然集中在农业部门，工业化、现代化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必然是与宪法制度的变化相伴而生的，在市场化改革的背后，往往出现的是对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性质与其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不如说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更为准确。中国的体制转型则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制度的改革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模式和道路，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场化改革反过来会推动宪法制度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何在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中心课题。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这三重转型便构成了本书对转型概念内涵的界定。

（四）转型的时间跨度和阶段划分

由于对转型概念的理解不同，关于中国转型的时间跨度和阶段划分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概括地说，主要有两种考虑：

第一，如果我们将转型问题狭义地定义为经济体制的转型，那么，在时间跨度上就大致上是从1978起到2010年，大约3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将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可以进一步划分成几个具体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是在计划体制外围进行试验和探索的初步改革阶段。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推进，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成就。

第二阶段（1984—1992年）是由计划体制外围部分逐步进入体制的核心部分（国有经济）的阶段。改革以建立和发展产品市场为主，基本上是增量改革，具有增量市场化的特征。

第三阶段（1992—1997年）是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局部的、单项的改革转向全面配套改革的阶段。市场化改革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和存量资产的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与此相适应，城市化步入一个新的更快发展阶段，并与要素市场化

形成一种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

第四阶段（1998—2010年）是积极促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

第二，如果对转型问题做广义的理解，那么，中国的转型期就应该理解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步。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并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人口占多数、包括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化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可见，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包括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从基本内容上看，与上述中国转型期的双重转换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就可以把中国的转型期理解为自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中期的历史进程，大约有100年的时间。

（五）研究意义

我们正在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型，正在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个富于挑战的、艰巨的、充满风险的任务。何况我们是在一块负载着太多人口的古老土地上，是在一个长期积弱积贫、饱